

## 對近代史研究所 正式成立前後的一些回憶

張玉法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於民國 44 年 2 月 1 日設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由郭廷以任籌備主任。開始的一、兩個月，只有兩個研究員，即郭先生和張貴永先生；一個副研究員，即王聿均先生；三個助理員，即李國祁、呂實強、賀凌虛三位先生。經十年籌備，至民國 54 年 4 月 1 日正式設所。我是在民國 53 年 7 月 2 日與陶英惠先生一起來近史所工作的，對從籌備到正式設所十年創業惟艱的情形當時一無所知。我來近史所的最初兩年多只是臨時人員，做口述歷史記錄（戢翼翹、劉和鼎、沈亦雲）、檔案標點（《四國新檔》）、在報紙上搜集當代史料等工作（選取資料請黃傳鑫先生剪貼）。民國 55 年 11 月我補為助理研究員，成為近史所的正式人員。補為正式人員後，所長分派給我的工作為搜集當代史料及記述當代史事日誌，暇中可以自己做些研究；所長指示給我的研究範圍是二十世紀中國，當時所內同仁多研究晚清史。作為所長的學生及近史所的初級研究人員，我所注意的是所長交付的工作和自己的研究工作，對所務所知甚少，對所長的公私生活尤毫無所知。《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出版前，黃所長要我校核一遍，我不敢答應，怕看不出什麼問題。在座的老一輩同仁，最有資格校核的是張朋園先生。據我所知，張朋園先生與郭先生的公私往來很多，從《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中，也可以看出張先生與郭先生往來的情形。感謝張先生花了許多時間校核殘稿，也感謝魏秀梅小姐、

張力先生等在出版期間參與校對工作，使《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能以較完善的面貌呈現在我們面前。

我於民國 53 年 7 月來所工作，57 年 10 月即在所的福特基金項目下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為期 1 年 9 個月。我在美國進修期間，郭先生赴美講學，所務由王樹槐先生代理，我於民國 59 年 8 月自美回所時，所務仍由王樹槐先生代理，後來郭先生辭職（民國 58 年 7 月正式辭職，中間沒有回國），即留在美國。因此，我在郭先生手下做事，只有四年，其中兩年多是臨時人員，一年多是助理研究員。這次紀念所慶，黃所長以〈從《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早期的發展〉為題，給我十分鐘，要我與在座的幾位先生談談當時的所務發展，我實在沒有多少親身經驗。倒是因為黃所長給了我這一個任務，我仔細的將我來所之日（民國 53 年 7 月 2 日）至日記殘稿終止之日（民國 56 年 7 月 31 日）三年多的日記看了一遍，勾引起我一些回憶。怕我回憶不清，曾請教張朋園先生和陶英惠先生，感謝陶英惠先生從自己的日記中抄錄一些資料，供我參閱。陶先生人緣好，有不少資深同仁告訴他一些所裡的秘辛，卻沒有人告訴我。記得我的學生王玉和另一位年輕人黃英哲後來在近史所做臨時人員。王玉對黃英哲說：「我們都是近史所的小草。」那時我已是研究員，我告訴王玉：「我也做過近史所的小草，小草雖然有人踐踏，但也有人

澆水，你們將來會長大的。」果不然，黃英哲不幾年就做了日本愛知大學的教授，而王玉也做了彰化師大的教授。

現在回過頭來說說郭先生在將所務交給王樹槐先生以前四年多我所看到和體驗到的所中情形。這四年中，院長王世杰先生對近史所基本上是支持的，院中各所所長只有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李濟對近史所懷有敵意。政府官員，蔣經國對郭先生很禮遇，李煥、潘振球等對郭先生也很幫忙。史學界，美國的費正清、韋慕廷、Franz Michael、George Taylor、Mary Wright、何廉等對近史所都很看重，國內學者吳相湘、胡秋原等則常寫文章批評郭先生。國內學者批評郭先生的部分原因是當時學術文教界的人經濟狀況都不好，而近史所受到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幾乎每一位研究同仁都可以分享一些，外面的人有些想參加研究計畫而不可得。

外界的大環境如此，郭先生本人則利用各種有利的條件，專心推動近史所的所務，並致力於個人的研究工作。郭先生與蔣經國關係良好，蔣經國有意安排郭先生任師大校長，透過李煥、潘振球等多次傳達此意，事在民國 54 至 55 年間，郭先生堅決拒絕此安排，先後拖了一年多，最後蔣經國不再堅持，因為活動此職的人很多，郭先生終於得到擺脫。郭先生之所以拒絕出任師大校長，託稱是身體不好，難任艱鉅，實則還是不想放棄他的研究工作，更不想放棄他辛辛苦苦所經營的近代史研究所。當時郭先生個

人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二，一是增補《現代中國史事日誌》（郭先生病逝後出版時改名《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常常參閱的資料有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日本外交年表》、《北伐戰史》、《順天時報》（微卷）等；二是撰寫《郭嵩燾年譜》。至於推動所務，可分五方面介紹：

其一、開闢財源，爭取經費：當時近史所從籌備到設立已十餘年，有研究人員二十餘人，連行政人員和臨時人員有三十餘人。有兩百坪二層研究大樓、兩百坪二層圖書館大樓，約一百坪二樓檔案館大樓。人員的待遇很低，助理研究員月薪只有 1,200 元。所裡的業務費、設備費很少，郭先生在日記中數次提到向政府爭取經費蓋檔案館，似無結果。據我所知，曾經借給臺史所的舊檔案館是向國科會爭取到七十萬元蓋成的。因此想購買圖書、整理向政府爭取來的檔案、推動口述歷史等工作，需要向外面或外國爭取經費。郭先生利用他的聲望和人脈，爭取到美國福特基金會十年的資助，共 30 多萬美元，郭先生以此派同仁出國進修、購置圖書設備，並雇用臨時人員從事口述歷史、編印檔案、調查史料等工作。其他單位資助近史所從事研究者尚有國科會（民國 56 年以前稱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哈佛燕京學社（東亞學術研究計畫委員會，由李濟主持，每年向哈燕社申請研究費，史語所每年可得三分之一的經費，近史所可得十分之一）、以及與近史所合作研究的單位，如華

盛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夏威夷大學等。

其二、網羅人才與培育人才：當時臺灣各大學的歷史系只有臺大設有碩士班，而臺大的高才生畢業之後多留學海外，在海外學有所成者很少歸國。近史所在籌備的十年期間以及設所後最初的幾年，所進用的人才，除郭先生在大陸時期曾教過的學生外，部分為在師大史地系所教過的學生，部分為臺大歷史系的畢業生，偶爾也有其他大學的畢業生。郭先生有時候急著用人，就去臺大歷史系和師大史地系去查應屆畢業生的成績，有的同事就是被查到後用進來的。郭先生用人也不拒絕毛遂自薦，但一定要有論文給他看；有時在較有學術性的刊物上看到一篇好文章，也可以請作者來近史所工作。說實在的，當時用進來的人，郭先生對他們並沒有信心；用進來以後，即多方設法培養。福特基金對近史所有十年的資助，郭先生就分批將同仁送往美、日、英、法等國進修或深造，先後送出者將近二十人，出國期限通常半年到一年多；有的同仁自己得到其他獎學金，可以讀到博士，有些讀到博士的同仁留在海外就業，沒有回來。但從近史所出國進修或留學的同仁，都是由郭先生寫介紹信。因為人才難得，對海外學成歸國者尤為器重。王萍小姐是威斯康辛大學的碩士，只要有外國學者來，郭先生帶他到部分同仁的研究室作介紹時，都會特別介紹王小姐。李國祁先生於民國 50 年自近史所去德國漢堡大學修博士，兩年後辭職，郭先生一直與

他保持聯絡，希望他畢業後仍回近史所工作，李先生也答應。郭先生與李先生聯絡的很勤，郭先生日記殘稿最後三年的日記，提到所內的同仁最多者為王爾敏，共 66 次，而提到李國祁者 81 次。81 次的內容，有些是李先生向郭先生報告畢業及個人計畫，大部分是郭先生為李先生安排赴美訪問、為他介紹美國各地學者、為他找旅費、為他辦聘任手續。最後因為李先生入境發生一點波折，李先生即自美國返回德國，聲稱不再回國。郭先生又想別的辦法，答應李先生來近史所做一年副研究員即升研究員，才把李先生請回來。當時自近史所前往巴黎大學修博士的陳三井先生也畢業回所，民國 57 年 6 月 1 日，與李先生同時被聘為副研究員。爭取海外人才回國是政府的政策，有許多優厚條件，研究院蓋有豪華的學人宿舍（是與一般公家宿舍比較而言），配給每一位自海外聘來研究院的新科博士。當初郭先生允許聘李先生為副所長，也允許配給宿舍，李先生都不願回來。後來郭先生允許李先生來近史所做副研究員一年即升研究員，李先生回來了，但一年後要升研究員在所務會議中被否決，那時是威權時期，郭先生寫了一個報告給院長，院務會議通過了，院長就聘李先生為研員。李先生確是大才，升研究員一年後就被師大借調任歷史研究所長，並留在師大專任，其後又任院長，又其後轉至中山大學任教務長，一度被蔣經國列為師大校長候選人，蔣經國與他談話時曾問他辦大學的理

念，他說要注重管理，不知何故未能入選。李國祁先生與陳三井先生回國後，近史所才有獲得博士學位的人才。當時所內的博士人才總是極少數，為了增加同仁的研究能力，郭先生對所內年輕同仁在學術上都當學生或學生輩來糾正或教導。譬如在討論會中，對提出學術報告的同仁批評毫不留情，我就是被批評者之一；譬如對要出版的專刊稿子，郭先生都要仔細修改，日記中記改稿有「逐句修正」、「極感吃力」等語，在此三年日記中記載被改過專刊稿的同仁有劉鳳翰、李恩涵、張存武、王萍、李毓澍、趙中孚、林明德、黃嘉謨、呂實強、元冰峰、王樹槐等人，改稿之後有時還將有關同仁叫去當面指導一番。很慚愧，我寫的第一本專刊《清季的立憲團體》，郭先生沒有幫我改，只說：「我找朋友看過了，可以出版。」後來我負責所務時找幾位同仁為一位同仁改專刊稿，這位同仁是博士，很生氣；這是我的錯，沒有為這位同仁留顏面。我印象最深的是郭先生為了提倡現代史研究，在所內不定期召集同仁上課，講述民國史，同仁們像學生一樣的記筆記；講過的題目有〈民清之際的袁世凱〉、〈洪憲帝制之由來〉、〈洪憲帝制的失敗〉、〈北洋派勢力的擴張〉、〈民國十三年國民黨在廣州之萍動奮發〉等，當時同仁多治晚清史，對民國史不熟，因此發言討論者極少，有時甚至沒有一個人。此外，郭先生還花錢讓同仁學日文，初時去羅斯福路的東方日語研究班（與我同

學的有陶英惠、亓冰峰、陳存恭、郭正昭、藍旭男等），後來請高雙英女士來所裡教日文，每週一次。看來近史所就是「郭廷以學校」。

其三、爭取國家檔案，促進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在郭先生主持所務期間，爭取到的國家檔案有外交部檔案、經濟部檔案，交通部檔案也在爭取中；這些檔案，可以說是當時近史所推動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的基本資產。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以對美國為主，最重要的是福特基金。福特基金從民國 51 年開始，先後兩期，各五年，實際上到民國 63 年才結束。在此項目下，近史所派研究人員出國進修、增加圖書設備、編印檔案；福特基金也安排美國年輕學人來近史所研究，有一個計畫是五年之內，派十位學者來近史所。除此之外，近史所與哥倫比亞大學訂有口述歷史合作計畫、與夏威夷大學訂有近代中國社會運動史合作計畫，而中國現代史史料調查計畫也是由美國十幾個大學出資進行的。其他合作計畫我不清楚，我個人參加中國現代史史料調查計畫，在草屯住了半年，嚴錦、藍旭男也去過，抄寫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的史料目錄，並加說明。此一調查計畫分兩部分，另一部分是編寫近史所所藏外交檔案目錄，我不記得有那些人參加。調查到的成果後來油印了十巨冊的一套書，不知現在還存在否？這個計畫的主持人是李毓澍先生，在他手下做事的人都有壓力。在史料調查告一段落、還沒有開始印刷

時，所務會議通過派我出國進修（民國 57 年 4 月 27 日），李先生把我叫到他的研究室，發出訓示：「你一定要負責把調查到的史料目錄油印出來，沒有完成前我不會讓你出國！」至於這個調查計畫的經費來源，我並不大清楚，據說是每一個需要此目錄的美國大學要出 500 元美金。那時的近史所像政府許多機關一樣，真是窮得可憐。近史所有美援，所以做了許多事，但國內得不到美援的學術文化界人士有人心不能平，就攻擊郭先生出賣國家檔案。更嚴重的是，因為費正清非常支持近史所，而費正清對中國的現狀主張一中一臺，大大違背中華民國的一中政策，因此攻擊郭先生的人又把郭先列為費正清的同路人。在當時肅殺的環境下，郭先生不得不走避美國，一去不回。郭先生可以說是為拓展近史所所務，被逼流亡海外。其實據我所知，有一位罵郭先生的人，已拿了至少一年福特基金補助，因為交不出成果，被郭先生停掉，就反臉罵人。

其四、消除同仁矛盾，照顧同仁的安全與生活：同仁之間的矛盾很多，被郭先生覺察到的有呂實強對李毓澍不滿，王爾敏對王聿均不滿，而最大的問題是所謂三公問題，即王聿均、李毓澍、黃嘉謨三位有資格參加所務會議的人，對郭先生、李國祁、王萍不滿，對年輕同仁升研究員幾乎全部進行否決，以便控制所務會議。近史所籌備期間，同仁升等原由郭先生一人決定，後來為了分擔責任，才交給所務會議，不意所務會

議成員四人，三人聯合杯葛所長。三人可以說都是郭所長調養長大的人，在威權時期，郭所長自然很傷心。民國 56 年 6 月 7 日的所務會議否決了張朋園、王璽的升副研究員的案子，僅通過張存武一人，不僅張、王二人生氣，連張存武、王萍也生氣。郭先生在日記中責備三公鬧意氣，自己又有倦勤之意（前此已因他事有此意）。既而想，如果自己生氣辭職，不是也鬧意氣嗎？留下近史所這個攤子怎麼辦？事情過去以後，郭先生還要一一安撫，而三公也向郭先生表示懺悔。否決升研究員的事在我赴美進修以後，不多談。郭先生照顧同仁，最顯著的例子是對魏廷朝的營救。民國 53 年 9 月 21 日的日記，記載魏廷朝、吳章銓三日前失蹤，吳回所，魏被關。原來魏涉嫌從事臺獨運動，而態度強硬，吳是被牽連的，因為治安人員在搜查魏廷朝的住處時發現有吳的一篇稿子。郭先生知道底蘊後，透過李煥找蔣經國，希望從輕發落，並親自去警總與魏談話。因為魏一直堅持主張，所以一直關著。後來郭找人帶

零用錢給魏，魏的妹妹也曾向郭打聽消息。魏廷朝、彭明敏被捕，引起費正清、韋慕廷等的關切，認為臺灣無自由，有終止福特基金資助計畫之考慮。郭先生百般疏通，終於化解。其他方面，郭先生尚有一些照顧同仁的小事，就我個人所知，如我和陶英惠、亓冰峰、陸寶千幾個臨時人員沒有宿舍住，郭先生向總務組為我們借宿舍，後來新任總務主任趙保軒認為我們沒有資格住，將我們趕走，所裡拿錢在研究院附近為我們租房子；又如出國進修同仁如修學位，特別補助註冊選課費，引起某些未修學位同仁之不滿，也要求同等待遇，發生一些爭端。所事千千萬，每一位同仁的天平不一樣，這是郭先生的難處。

以上是我體會到的郭先生的治所理念及其所遇到的問題，時距現在已五十年，有些事情的内幕我不清楚，有些事情因為時間久遠記不清楚，所說是否有偏差或錯誤，請各位同仁及來賓指正。（民國 102 年 2 月 21 日）